

张新宇 | 从“赋权”到“助人”

关键词

乡村自组织、乡村性教育、具身性

访谈文字记录

01 乡村儿童性教育 (0:00-22:57)

蒋雪玮

Hello, 新宇你好! 很高兴邀请到您做我们这次的访谈嘉宾。其实我们两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熟一点了,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的读者或者听众来说, ta 们不是很了解新宇是在做什么。所以在访谈的开始, 你能不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张新宇

OK. 我从 2012 年开始在全职做公益……妈呀, 这样真的是十年做公益人了! 太可怕了!

因为自己一开始比较聚焦——我一直想的是要做妇女相关的, 所以当时 2012 年回国找工作的时候, 也只是找了性别领域的。然后当时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当时负责的就是儿童性侵犯预防项目。当时其实我是比较想做乡村妇女, 就是“赋权”那一块儿的, 但刚好儿童性侵犯项目缺人, 所以机构就让我去做这个项目。然后从那之后就算是跨在两个领域之间: 一方面就是儿童的性侵犯预防。那在国内, 包括我自己之前做的也都是通过性教育来作为一种预防儿童性侵犯的手段; 那没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乡村妇女的赋权。我在农家女的时候还负责过比较多的乡村妇女赋权的直接的项目。但是到了绿芽, 就是 2014 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自己就结了婚, 然后搬到广州这边。然后刚好在广州有绿芽基金会(全名: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 所以我 14 年也就转到绿芽基金会。转到绿芽之后, 反而就做乡村妇女赋权那一块, 相对做的就比较少一点, 主要就是通过儿童性教育的形式来去和乡村姐妹合作。那这可能还要说一下我们的项目模式, 因为不管是绿芽还是农家女, 我们其实在乡村都是通过乡村社区的妇女自组织来把我们的项目落到实地。那这些乡村妇女自组织有一些(是)我们去发掘这个村庄里已经存在的那些妇女机构; 那另外一种就是, 可能有一两个比较积极的乡村姐妹, 我们就帮助他在村庄里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 有的时候是和政府合作, 各种形式。我们的乡村儿童性教育项目很多时候也是跟乡村妇女的组织合作。所以从 2014 年之后, 我的工作内容和形式基本上就变成了: 通过跟乡村姐

妹的合作，把儿童性教育带到她们的村庄去。所以一直都是两条主线并行。我自己可能在儿童性教育领域也是特别注重乡村妇女，还有就是乡村的实践这一块儿的；然后在乡村发展或者乡村女性这一块儿领域，我又是一个做儿童性教育的人，所以有一点夹在中间的感觉。

但这个都是在2019，2020年7月之前的情况。2020年7月之后我不是就辞职了嘛，然后到现在一年多，我现在这段时间还是跟几个乡村姐妹、几个乡村姐妹的自组织有联系。然后他们平时如果有什么事儿也会跟我说，就像我们有一个姐妹，前段时间她自己要在村里做调研，然后又有包括她们团队，也有些她想要、可能（也）需要一些建议，然后她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就会跟她聊天。所以这段时间可能自己的身份更多的是偏向于一种……怎么说，公益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就是给这些姐妹提供一些辅助，那同时也会给一些熟悉的朋友帮忙做性教育培训或者性别方面（的）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会帮忙做。

这个就是我迄今为止十年的工作。

蒋雪玮

这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一开始2012年回国的时候，其实是想做妇女赋权这方面的，尤其是乡村妇女赋权这方面的，所以去了农家女，但是感觉是阴差阳错，做了儿童性侵防御这一块。

张新宇

对对，这其实我自己有段时间很纠结。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做的好像跟性别平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是通过是从纠结到不纠结，再到又纠结又好几轮轮回。最初纠结会觉得好像直接做的跟性别平等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比同事，她们天天都是在搞什么妇女能力建设，然后什么小额资助，然后团队建设……然后每次我跟他们一起出差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呐！这个才是真正的工作！”

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那么纠结，因为我那段时间会有一点把性教育当成一种促进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就算从孩子抓起。所以我当时做的性教育也会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我们特别强调性别多元——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现在在做的人不一定跟我想的一样——但至少在我做的时候，我们会在做的各种教材中特别强调LGBT，特别强调就是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概念，然后特别强调性别平等的重要。甚至你最后会发现我们做的性教育中，性侵犯的内容可能只占5%到10%，实际上在做的是一个全面的性教育。这其实也是性教育行业大家都在做的事儿，很多机构在做的都是全面的、综合的性教育。

但是后来我又开始纠结，这个纠结其实算是我最后决定辞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虽然不仅这一个原因也有很多原因，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开始怀疑通过教育这种模式，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的途径是推广标准的课程包（是否真的有效）。当时大家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提供性教育，让孩子先具备性教育的知识。但是2019年的时候，我和当时一个研究团队的伙伴一起在一个村庄做了一次很深入的

调研，大概做了几个月。我们发现，其实孩子并不是不知道很多（有关性教育、性别平等的）知识。但是孩子在学校学到的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到底在ta们的现实生活中能有多少转化成ta们的行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东西。就像我们说性教育，它希望改变孩子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这三个维度。知识，其实最好改变的。孩子学一节课，只要认真听，怎么样都能听得七七八八。那些知识都非常简单。但是孩子的态度到底能不能改变，ta的态度是由什么样的东西决定的，以及ta的行为是由什么样的东西决定的，（是课程很难改变的）。

之前我们跟研究团队的伙伴讨论，说我们在学校都学过，说我们要“勤洗手多锻炼”，要做一个“健康向上，好好学习，热情洋溢”的那种小孩。但实际上这些是知识，这些道理我都懂的。但实际上很难转化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其实是知道哪些东西不能谈不能看的。我们当时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孩子一台相机，让ta们回家去拍自己家里和性教育有关的内容。当时ta们已经上过几节性教育课，而且是我给他们上的。当时课堂整个反映就会觉得都很好，孩子们回答问题也很积极，感觉对知识的接受度也很高。（ta们）都已经是小学三年级以上，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所以也不存在说讲的东西ta理解不了。但是我们把相机给到孩子，本来期望收回来的照片会有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孩子都刻意的回避了一些东西。当时我们会有一个小组内部有个讨论，说重要的东西反而不是出现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东西应该出现，但是诡异地没出现。就像一个研究团队（跟踪调查的）所有的，十几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拍村庄那个墙上的流产广告和性病广告，但那个就是ta们每天必须经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明确跟“性”有关的。我们让孩子拍自己的厕所、浴室等等，有些孩子也会非常避讳。那会有些孩子在后期的访谈中会聊到说，ta们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不能拍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知识和ta的态度和ta的行为之间的一个脱钩。不管我们在课堂上再怎么讲，“你是可以讨论性的，这是很正常的知识”。但是ta的父母，ta的兄弟姐妹，还有整个村庄的环境，别人的态度也是一时改变不了的。那ta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不会做出相应的行为。那ta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态度？如果ta的行为不能体现ta的态度，那你怎么来判断说ta真的是有这样的态度，或者说ta自己未来会做出我们期待的行为呢？那还有第二个给我们留下非常印象的事件是，我们让这些孩子去让ta们的父母配合ta们的拍摄。然后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人最后找到ta们父母去拍摄。因为那个村庄它们那边孩子真的很多，所以这些孩子ta们会有一种共识是：父母养育自己很辛苦，ta们不能对父母做出额外的要求。其实很多我们去过的其他村庄都不是这样的。父母平时配合ta们（的学习），（需要）什么样ta们都会做。但这个村庄就是我们当时没想到。那所以又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在课上也讲了性别平等，也讲了父母应该都承担家务。但是这些孩子实际看到的是，ta们不可能对父母做出什么样的要求，ta们也不可能要求父母去配合ta们（实践）在课堂上学到这些知识，ta们只能去配合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些其实是给我蛮大的冲击的。

然后再加上自己当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周期，看了一些人文社科的书籍。给我一种比较大冲击的一种观点，是台湾的一位老师，ta写的就是关于性教育。之前我也看过（ta的著作），但当时我还没有做过这个研究，所以感觉还没那么深。但真的是，当

你在实际场景中见到了这些理论在实际中的体现，然后你再去看这些话，也会是不一样的（感受）。他说，其实我们现在通过性教育希望实现的那个目标——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一直存在这种感觉——是一个非常……所谓健康、正常，能够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和性有关的事情做决定，然后又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还能和伴侣维持很正常的关系，然后还能拥抱自己的多元性取向……这其实是非常西方白人中产的一种典型形象。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太好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我们的孩子……但这一点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纠结：首先，如果我还是相信说，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通过性教育来实现我们讨论的这些目标，比如说能够在性方面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决定，保护自己的生殖健康、生育，然后在多元性别方面可以接受自己和他人，这真的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下去，然后我们把它定为我们的目标，会不会有一点太浪费？我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形容我的感受，我也不能说“太浪费”。因为实际上，我的所有的伙伴，ta们和我当初一样，都是相信这个目标的，大家也实实在在是做了很多工作，也确实带来了很大改变。但是我会开始质疑，这是不是我真正认可的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性教育来让中国的孩子，包括乡村的孩子，都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尤其是学校教育。你知道它（学校教育）的一个问题是它有一套标准。那一旦有一套标准，它就肯定会有不符合那个标准的人，（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不是性教育的问题，就是我开始怀疑这种标准化的、统一的、有一个明确目标的、可以衡量的明确目标的这种性教育，是不是真的那么站得住脚？我并不是在质疑那些同伴在做的事情，这真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取向问题。后来再加上其他很多的事情，我就决定先退出来，然后退出来之后在性教育方面，这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帮朋友做一些师资培训，但是对小孩的事情我是一点都没做。反而会做的比较多的是和很多乡村姐妹去实际地交流，去了解她们村庄的情况。

然后对我冲击又比较大的是去年河南水灾的时候，我当时有在卓明（全名：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做志愿者，然后就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个女性，我后来也去了她的村子。她在当地自己做生意，然后她自己也有一个她的妇女团队。她们那个妇女团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村庄，或者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或者像我们（之前）接触的姐妹……而是她自己的一群姐妹，（她们）就很像是那种真的草根组织。但是又有一个不同的是，这个姐妹她特别有钱。见面第一次就问我，“你大学生一年能赚多少钱？”我跟她大概说了一个数，然后她说我去年一年赚了60万。等于是用她的经济实力吸引了一群乡村女性在她身边。按照任何一个标准来说，她肯定都不是一个乡村发展者。但我觉得这个案例对我的冲击在于，你会发现其实妇女的赋权真是有不同的形态的。那包括她这个女性，她可能在一方面她很符合我们所说的那种，我们希望乡村妇女实现的一种状态。但在另外一方面，她的很多观念又是非常不符合我们希望乡村妇女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矛盾性在这个人身上的体现，真的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复杂的。虽然我会觉得我在公益圈儿做了快十年，居然还能说出这句话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儿，就好像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在公益圈做久了，也可能会有有一些标准：就是你觉得孩子们应该是什么样，乡村女性应该是什么

样……但是ta们可能是其他的模样，甚至和我们的期待南辕北辙，但是那仍然是一种发展的可能。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想，我自己如果将来还做“妇女”或者说“性别”这一块，我就不会再去做那种“empowerment”或者说“教育课程”这些。相反的，我会去研究不同地方的那种妇女自组织，然后她们有哪些应对她们（所处的）环境，不管这种应对是应对一个自然灾害，还是应对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或者是应对暴力……她们在生活中有哪些实际的窍门。她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去应对的。甚至我可能会介绍这些妇女组织，就形成更大的团结。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现在会觉得比较站得住脚的一种途径。说回2019年的那个研究。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们也有很聪明的一些应对技巧。就像ta们不去谈论和性有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一种自我保护技巧。但我觉得我的思考肯定都还是很初级的阶段。大概从2019才开始去想，去看书，和乡村姐妹和朋友去讨论。我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可能我刚才说的又都是错的，可能那种标准化的也是一种很正确的途径。但是，反正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

蒋雪玮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大部分现在的性教育机构，ta们面向的对象其实很多是城市女性甚至是大学生。做乡村性教育或者说留守儿童性教育的机构其实并不是很多。如果你问一个城市的女性，或者说一个城市的、相对进步的男性“性教育是什么？”，他们就会说出你刚刚说的那一套标准：性别平等，性别多元，帮助我们和我们的伴侣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建立亲密关系等等。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会认为的性教育的状态。但是其实可能在本土的实践当中，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标准并不是很适配。

张新宇

对，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怀疑这到底是因为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是一些别的问题。但是如果用“我们的发展阶段没有那么地先进”，好像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城市里面这些能理解这个标准的人，才是正确的、文明的，然后另外一方又是未开化的。我现在很反感这种叙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包括我们认识的乡村姐妹，去年和我沟通比较多的一位乡村姐妹，她自己在村庄做性教育做得很积极，然后她下载过很多课件。但性教育里她会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是说怎么避孕；然后第二个她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告诉了孩子们保护自己的身体。她就很明确的说，她觉得性教育有用是因为可以让自己的女儿不要发生性婚前性行为。然后我就不太敢跟她说，联合国的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性教育可能会导致性行为年龄提前，但是会使安全性行为比例上升。大家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但你进一步又要说到，她有没有权利去决定她的女儿什么时候发生性行为？然后她也决定不了。而且乡村孩子其实发生性行为是很早，ta们结婚进入婚姻，生孩子的年龄都很早，所以就很复杂。

然后又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最近会感触很深的，我和另外一个就做社科的朋友也有说过这个，就是城市的性教育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不怕孩子的性行为年龄提前，那只要他们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就好。这句话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里可能是立得住脚的。但是对于很多乡村孩子来说，ta们真实的状态是，ta们性行为年龄是很早的，也是不安全的。ta们的性行为年龄早是因为ta们很早进入婚姻和生育。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你说想通过性教育促进ta们不怕提早性行为年龄，而是进行更安全的性教育，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错位。

然后包括生育权。但是其实很多乡村女性，她的生育决定权真的不在自己手里。我不觉得这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能怎么办？你除非……哪怕那些男的都死完了，她也有她的妈妈婆婆姐妹这种的，就是很纠结。我觉得我没有答案。

我觉得自从我19年的价值崩塌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以前感觉还是很激情洋溢的，觉得自己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然后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尤其是每次和伙伴们聚在一起之后，看到那些数据，你会觉得我们确实是在带来改变。但是从2019年做完那个研究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现在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有定论，而且我也不再相信自己真的做出过很多贡献，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种感受。（项目）也花了很多钱……因为从我14年过去，绿芽还是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当时我们跟谁合作，然后做什么样的预算，我都可以做主。然后最后你觉得就有点崩塌，这种感觉很不好。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以前那种斗志昂扬，觉得我在改变世界的状态，但是没办法，你真的骗不了自己，你也回不去了。妈呀。

02 迷茫与探索 (22:58-27:39)

蒋雪玮

所以说19年其实是算一个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是吗？

张新宇

对，算是还蛮严重的分水岭，而且其实还蛮宿命感的。之前那个研究，最后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照片展。那个照片展撤展的那天就是1月19号，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撤展的团队中本来有一个武汉的志愿者，一个武汉大学学生回来当我们的志愿者。撤展那天我走出那个场馆，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虚无，然后紧接着疫情就发生了。然后就接二连三地……就有很强烈的个人命运跟时代绑在一起的感觉。当然这也是我想多了，但就还是会有很强的崩塌感。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都不是特别愿意看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有很多问题。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有很多其他伙伴的努力，所以我也不能说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自己的时候就不太想把它跟我自己弄成了（联系在一起）。我们家现在还挂着两幅画，是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主人公的形象。我觉得是在我最相信这一套的时候，我把那两幅画挂到了我家的墙上。现在我每次看到那两幅画就感觉有种被针扎了

一下的那种感觉，还挺不好的。这其实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心态。对，我现在可能也在努力克服吧。

蒋雪玮

所以现在有什么尝试，无论是在做新的项目，还是说在走新的道路，或者说开始新的学习，有想过是不是说纠正之前的那一套方法。可能说会不会对新的方法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什么行为想要去做去……19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自己，或者有什么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行动？

张新宇

我觉得会比较有用的一种就是：我现在不太会把自己定义成说“我要去改变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要向大家传递什么样的知识”，然后普及什么。以前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话是“我们要传递、帮助、普及、提升、改变”。但我现在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比较有用的一种方法论是：我作为一个帮忙的人。我现在和很多乡村姐妹维系的一种关系是，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我就帮你一下。好像是这个团队的一个勤杂工。我会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安全，又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心安理得的一种状态。因为确实也会有一些乡村姐妹她们不太了解的信息，甚至包括她们小孩有的时候想报什么辅导班，她们都会想来问问我，我就会给她们一些建议。在这种状态，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也不能说这样我就是她们中间的一页了，因为确实大家在地理空间上，或者说在实际身处的境遇上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不是在打乱这个地方的生态，而是在辅助。

蒋雪玮

其实听起来会像是一个从标准出发，然后转变到说是从人出发的这样的一个。

张新宇

我自己也会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就有从“人”这么大。但这样说得好像有一点暗含在否定那个标准看不到人。其实以前的伙伴他们在制定标准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很多具体的人，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角色的一种变化。以前我会把自己看着那个很有能力的，或者说有一定能力的那种改变者，但是现在可能更想要当的是一个帮忙的人，真的是帮忙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最安全的一种状态。

蒋雪玮

这种安全是说对于自己来说还是？

张新宇

对于价值观来说的安全。当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帮手的人，我不会觉得有这么强的虚无感和崩塌感。你会觉得我现在是在帮忙，会觉得还蛮安心的。

03 对公益行业本土化的思考 (27:40-44:33)

蒋雪玮

我不知道……也不是说这个是错的，但是常常在当下的这个情境当中，很多价值倡导确实会让我感到会有一点虚无。因为我其实知道说是做不到的，我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因为很多价值倡导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东西。因为本来公益，它其实相对来说算是一个舶来品，它其实是一个无论它的价值也好，它的很多理念也好，其实是舶来的。然后我们本土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不能说是很多我们本土的社会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套东西它真的能够适配在这片土地上吗？很多我们的实践告诉我们其实不能，但是我们又非常缺乏另外一套东西，告诉你说怎样是能的。然后你不断去探索，你最后发现似乎怎样都不对。

张新宇

而且本土化还有另外一个陷阱，就是你身段柔软要柔软到什么程度，我们说肯定不能是西方的那一套，这个其实很多公益行业的人都赞成。但是当时我们包括做性教育的时候，也会发生那种，比如说一些疾控的、政府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持保守价值观（的人）会说“你们这些就是西方那一套”。但ta说这句话的时候ta指的意思，ta要回归的那种东西，又是我们不愿意去回归的。所以就是在夹缝中。西方那一套，你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是你回到哪里去？你能回到那些传统中去吗？那所谓的“传统”它又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所以好像在中间两边，这种撕裂感真的还是挺强的。

蒋雪玮

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政府也好，疾控也好，ta们的逻辑是我们不愿意回归的。但是毕竟你要和当地的去合作。西方这一套是不适配的。政府和疾控这一套既不是我们想要的，甚至可能也不是当地人想要的。

张新宇

可能以前，比如说像联合国主导的那套“全面性教育”，政府跟疾控的人可能会说这一套不适合中国，但是ta们自己对于乡村，或者说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基于）在ta是作为政府的一员，ta其实也不是真实的中国社会，ta只是公务员系统。我会感觉很深是因为跟乡村姐妹聊天，她们有一些人的村子也是那种扶贫重点驻点的村，也有扶贫干部。我去她们村子的时候，也跟一些扶贫干部打过交道。我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觉：一些扶贫干部ta们在村子里，但是实际上你觉得ta又不在村子里，因为ta看到的真的很少。ta其实也是带着ta的一套标准想要来改造这些人。比如说你不能穷，你穷是不对的，然后你也不能太懒。然后政府……ta们会经常说是“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你们为什么还不珍惜？”你说ta们真的了解中国的农村吗？我不觉得。我以前会觉得很多乡村干部很了解。但我现在觉得，其实会了解（乡村）的是那

些乡村的村委会的，像这些层级的干部。但是到了县级这个级别，ta 们是不是就了解村庄，我真是觉得不一定。ta 看见了，但 ta 不一定真的“看得见”。网上也有很多扶贫干部吐槽说“那些老百姓又穷又懒，重男轻女”。不是说这些就不该批判，但是 ta 们批判的角度是 ta 明显不是这个村子的一员，ta 只是来执行任务的。

蒋雪玮

在可能说 2019 年之后，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你会觉得是符合你现阶段的（感受），缓解你现阶段的一些焦虑或者一些有纠结的？

张新宇

还是挺多的。反而是因为辞职了嘛。所以有更多时间跟乡村姐妹聊天。以前上班的时候你跟她们聊天可能都是带着任务去的，但现在就是什么都可以讲，然后给建议也是，包括生活，包括团队，什么都会给。我觉得这些状态还蛮好的。包括我现在还在给一个乡村姐妹的小孩，她小孩念初中，我在给 ta 补习英语课。你会觉得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好的一种尝试。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是你们团队的编外闲散人员，你团队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需要我帮忙，我就远程帮一下，或者有的时候偶尔能去就去一下，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

蒋雪玮

但感觉这种状态其实和很多公众也好，或者甚至公益行业本身的人也好，ta 定义里的公益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大家定义里的公益其实是有一套标准的，是有一个项目的目标，然后有一个愿景的。

张新宇

啊，愿景。好熟悉的词。有一个乡村姐妹，她在写项目书的时候，就她申请一个基金，她要写她们机构的什么三年目标，五年目标，然后使命、愿景，然后我还帮她谄了这一套。以前培训出来的写项目书的技能终于发挥到了用场。

对，我觉得那些肯定是有它的意义的，也能带来一些改变，但只能说我自己不想去参与，我并不是在否定它。就像比如说搞金融，它也在创造很大的价值，也在创造就业。如果说现在国家下令说我们把金融行业禁止，我肯定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但就我自己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蒋雪玮

我理解。你之前也从 2012 年到 2019 年也是公益行业的从业者，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从业者。其实大家也会感觉到这个行业是不像外界想的这么理想化，或者不像外界想的这么自由的一个情况，也会面临到各方面的压力，有很多各方面的需求要去做。你有时候反而会需要在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资方想做的事情，和政府想做的事情当中去权

衡一个可能折中的方案。我其实很理解你讲的那种非常感觉，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而就算有的时候其实你达到了你所谓想要的目的，你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吗？你会不停地去怀疑。

张新宇

你刚才说在资方的诉求和政府间，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公益圈突然特别流行，说“模块化，可复制，大规模”。我觉得真的是新媒体和互联网思维对公益行业的全面入侵。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可能公益圈有1/3的人是在做这些事情，或者甚至1/5的人，或者更少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人，大家都还是在做一些比较草根，比较小而美，或者说比较非常本地化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会觉得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但现在好像所有的机构，哪怕是一个成立没多久，一年资金可能就是几十万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都在问你这个项目的未来，有什么可持续，自我造血，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模式。就很荒谬。我觉得是市场逻辑对公益逻辑的一种绑架。这样说好像是想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觉得你是可以用这种想法去做一些事，包括我自己当年有段时间也特别相信这一套，但是真的会在做的过程中慢慢却感到困乏，甚至都不是说在做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本质的逻辑上，就是“模块化、可复制、可推广”，然后最后搞得大家都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商业的，很新自由主义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被绑架。你不能渴望大家都能用同一套东西，然后也不能渴望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自我造血的。你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我造血，国家就不需要有福利了，对不对？

蒋雪玮

你会感觉到说似乎行业里面有这样理念的人的声音不大，或者说是整个行业其实更多的会趋向于说去做可复制、可持续这样的一种生态。

张新宇

我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包括有一些相信这些人，我觉得我还是跟ta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其中的一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对公益行业还是有一些比较高的标准。如果我现在是在一个银行，然后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现在来挣钱的，我可能就不会对我的工作有这么高的要求。这可能是一种洁癖。这个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这个（一个）问题，就没有把它真的当成一份工作，还是自己赋予了太多情感和价值在上面。所以当你发现这份工作情感和价值崩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维系。但说真的，公益行业的工资这么低，如果不是为了情感和价值，我干嘛要在这耗着，是吧？

蒋雪玮

这其实我也很好奇说一开始怎么会想到说要进入这个公益行业的？

张新宇

公益圈儿，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做其他行业，你考公务员，你去银行，你做任何的事情，做土木，然后卖房子，大家都不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份职业。只有公益人会被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份职业。但工资确实也就……因为我的标准是能养活我自己就够了，所以我会觉得也不算是特别低，但肯定也不算是一个大家理想中的那种又稳定又体面（的工作）。一般来说（有些工作）你赚不到钱，至少你要稳定。公益圈就是两头都不占，而且还特别忙。

我其实还蛮明确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很多志愿者的工作。而且我其实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的。大一开始做志愿者，然后慢慢会觉得去服务、去参与这些，会是我比较想做的一种东西。我一开始做的是乡村儿童的支教，包括一些残障儿童的服务。在大三的时候接受了一些培训，开始想了解一些性别方面的理念。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开始想到说未来能不能全职做公益。我是05年上大学，09年毕业，那个时候国内全职做公益的人还不多，而且工资确实也不高。但是我就跟我父母谈——这确实算是有一点点，你需要check自己privilege的一个东西——我爸妈也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就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我说父母都能支持你。所以就出国读了这个专业。其实我从08年开始准备申请的时候，我就很明确自己将来就要做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挺水到渠成的一件事。2014年结了婚——这又是特别不女权的一个事，因为我丈夫他收入是比较高的，所以是他在养家——那真是特别不女权的一个事儿，很多时候我确实一直觉得这说出去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可能生活上的问题一直不是特别需要我去考虑。所以这块我少了一个隐忧。但是真的去做公益，我觉得很简单，我觉得自己还挺喜欢它的，觉得这个是我能做好，而且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蒋雪玮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访谈了一些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来做公益必然抱着比较高尚的目的，或者说你来做公益必然是怎样。但是很多人给我的回答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想做，我能做，然后我觉得我能做好”，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点点出我意料的答案。

张新宇

真的。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做好，因为你让我想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去考公务员吗？或者我去……我不是指责这些人，但是就可能有个很重要原因，也确实是没有经过生活的毒打。比如说有一天你真的被环境逼到，你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想自己喜欢做什么，更擅长做什么。但是在有一些空间的时候，你会去考虑这些。确实会觉得我的性格也好，或者我各方面也好，我是最适合做这个的。在工作以后，虽然我对公益圈有很多的“幻灭”，但那首先也是因为我寄托了很多情感在这儿。这就包括我身边认识的朋友，然后工作的环境确实是非常宽松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好的对样本，就是我丈夫。我跟他的同事吃饭的时候会觉得，确实我好像只能做公益。你让我跟这些人当同事，我真是办不到。

蒋雪玮

对，是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公益其实是一个“温饱思淫欲”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行业。你有了一定的基础，你觉得说我应该去投身社会了，那我出来做公益。但是其实好像很多公益人，其实他们把公益更多的当成一个职业选择，是考虑在对自己的职业范围内的一个职业选择，觉得说好像我适合做这个。

张新宇

但基本上大家也都不会有特别强的赚钱的压力，就不会说我一定要赚到多少钱，改变自己的人生状况或者怎么样。有这种压力在的话，你也很难说去思考。对，就这样。

蒋雪玮

所以其实可能说因为自己觉得说自己能做好，或者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虽然可能19年之后对整体行业或者说对自己做的事情有很多纠结和疑虑，但还是其实可能也还会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是吗？

张新宇

对。我现在反而会一直想起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我最初了解公益行业是做志愿者，后来我们学校社工系的老师，我有去选课。当时大家倒不是说公益行业，大家说的是助人行业。因为当时我社工系的办公室上写着“助人自助”四个字，所以最初我对公益的了解是“它是一个助人行业”。所以反而现在是有一点点回归初心，就会觉得在帮助别人。可能以前公益行业大家会觉得我要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或者挑战这个文化，然后我去助人。但是，现在我自己比较接受的一种途径是，我去做一些很“具身性”的，你的身体能感受到的一些助人。但都是大的助人行业。

蒋雪玮

因为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去帮助很多乡村自组织或者是跟她们聊天。其实可能是通过这两年疫情，我们发现其实与人沟通就陪伴或者说非常简单的跟人聊天，其实也是助人的一部分，不是说你必须要做一些非常大的东西，才会说是助人。

张新宇

对。还有就是，我现在真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照料别人。所以就渐渐的变成了一个照护者。但我觉得这种就还挺好的。对，我觉得这个还就是帮帮忙的一个，帮忙的人、照料的人、助人的人，这个就还蛮重要的。对我来说。

